

# 明代嘉万之际吴中文章观冲突之考论

——以皇甫汈与王世贞、刘凤的对立为中心

李慈瑶

**内容提要** 明代嘉万之际，吴中文学传统与复古主义思潮产生激烈的本土对抗。其中，前者是由皇甫汈代表的当地主流，后者则为王世贞、刘凤等少数复古人士所倡导。双方的文章观有三大不同：第一，对以六朝文为标志的吴中文统尊贬不一；第二，对骈散、“文”“质”的地位高下各执己见；第三，在骈文的创作手法及风格上旨趣互异。两派文章观的冲突以嘉靖时期的几次文风更替为背景，基于吴中两代作家文学经验上的代沟而产生。

**关键词** 嘉万之际 皇甫汈 王世贞 刘凤

王世贞曾对晚明以前的明文流变情况做过一次清晰的梳理：“国初诸公承元习一变也，其才雄，其学博，其失冗而易；东里再变之，稍有则矣，旨则浅，质则薄；献吉三变之，复古矣，其流弊蹈而使人厌；勉之诸公四变而六朝，其情辞丽矣，其失靡而浮；晋江诸公又变之为欧、曾，近实矣，其失衍而卑。”<sup>①</sup>其中，“四变而六朝”由黄省曾等吴中文人领衔，是正嘉间一次以骈文补救散文之失的文学尝试。它在全国范围内的影响力固然有限而短暂，却极大地迎合了吴人的地方风习和文学传统，成为当地骈文活动滋蔓的契机。另一方面，稍后兴起的后七子复古派开始逐步占据文坛主流，并将浮靡的六朝文作为批判、矫正的对象之一。吴地出身的王世贞、刘凤等人积极倡导和响应了这一主张，从而使得这次文章观的对抗表现出鲜明的本土化新倾向。

王世贞的“五变说”有着极强的内在逻辑性，是以历次文风之得失互补作为明文演进的根本动力。黄省曾有功于“北学南迁”、南北相济，是承复古之绪、泛六朝之澜的桥梁式人物，所以独独选择他作为四变的代表，不仅是基于对其文学成就的综合考量，还在于他十分契合这一理论体系本身的建构宗旨。然而，王氏的表述视角虽然敏锐地揭示出文学系统内部自我调节的良性态势，却也在很大程度上淡化和掩藏了那些相应而生的、并不友好的地缘冲突与流派摩擦。其实，同以六朝文著称的皇甫汈“身曳北地之后尘，与毗陵分队，其在琅邪为先声，身际文坛之三变，而能独行一意，无所因附”<sup>②</sup>，无疑更能鲜明地传达出四变专属的、无兼容性的文学特质。而他与复古派的强烈反差，也能帮助我们拨开萦绕于吴中文学生态的一些暧昧云雾，令各类文学思想交织、递变的层次感得以凸显。因此，以皇甫汈与王世贞、刘凤的论争为考察标本，正有利于深入了解嘉万之际文学背景的演变轨迹和多元形态，透视作者观念异同下的复杂心理。

① 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二七《答王贡士文禄》，台湾伟文图书出版社1976年版，第12册，第5922—5923页。

② 张燮《霏云居集》卷五三《书〈皇甫子循集〉后》，《四库禁毁书丛刊补编》，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59册，第625页。

## 一 文风的更替与矛盾的产生

作为中晚明文学的一股重要力量,吴中派约形成于成化间,以沈周为标志。到了弘治、正德间,随着祝允明、唐寅、徐祯卿等一批才华横溢、富于个性的杰出才人的涌现,其文学活动也达到了立国以来前所未有的活跃状态。吴中文学的创作群体与风格手法都紧密依附于东南一隅特有的人文历史与自然环境,即以江左文人为主力,偏好六朝文学,表现出极强的区域封闭性。与之相反,稍后兴起的前七子流派以京城为核心,以西北为后盾,有着劲猛的地域扩张性,从而实现了覆盖全国的文学影响力。徐祯卿之自变文风、改投李梦阳麾下正可视为复古派侵入吴文学领土的象征性事件。而正是在这以后,进入嘉靖初的吴中派也迎来了它的衰变期。衰变期形势之复杂在于一部分吴中人士已主动过渡至复古派等其他阵营;另一部分仍勉力延续余脉,如皇甫汈等;还有一部分则两者兼而有之,如黄省曾等。

嘉靖后期是明代文学风向发生转变的又一个重要时段。六朝初唐派的领袖杨慎及唐宋派盟主王慎中、唐顺之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三十九年相继亡故;相反,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复古派则重整旗鼓,卷土重来,再次强势操控了大一统的文学主权。而且有别于前七子的是,后七子阵营的骨干作家多为南人,这就使得吴中地域文风与外来复古思潮间的矛盾更加前线化、白热化。该矛盾在文章领域最突出的表现即为六朝骈文与秦汉古文间的对抗。

而当时,吴中文学的创作主力恰好面临着更替,一度驰声翰苑、发扬地域文学的名家已经渐次凋零:黄省曾、皇甫汈卒于嘉靖二十五年(1546),皇甫冲卒于三十七年,皇甫濂卒于四十三年。唯有皇甫汈一人颇为长寿,他在万历十一年(1583)才以八十高龄离世,因而成为了嘉万之际鼓动吴中骈文余波的重要人物。皇甫汈早年即在富于才士的吴人群体中位列翘楚:“八子齐名,吴趋为之语曰:‘黄家二龙、王氏双璧、皇甫四杰,凤毛鸾翼。’同学莫敢仰视矣。”<sup>①</sup>其后,与各派文学名流的广泛交游更令他声名日盛:嘉靖八年(1529)进士登第,与唐顺之、李开先、罗洪先、陈束等皆有同年之谊;十八年谪官黄州,又与王慎中、王廷陈等交往密切;二十三年补南京吏部稽勋司员外郎,和蔡汝楠、施峻、徐京等数相燕会;三十年赴京候选,又结识了李攀龙、王世贞、谢榛等后七子成员;三十三年贬滇南后,则与杨慎、张含等多诗文酬答。三十五年起,皇甫汈结束仕宦生涯,专心乡居,此时的他已是誉满天下。王世贞在《〈潘润夫家存稿〉序》中曾提到隆万间当地诗歌创作的一大怪相:“吾吴中盛文献,彬彬阡陌诗书矣,然好推尊其时显重者,耳传而共为其名。以故一徐庾出而语语月露,一元白贵而人人长庆,沿好成格,沿格成俗,而不可挽也。”<sup>②</sup>此理亦可推及文章领域。弘正以来,吴地复苏的江左文学传统本就日渐成格成俗,皇甫汈兼有地方世阀、海内文宗、进士出身、耆老乡宦等多重显重的社会身份,更在四六创作上一度享有“名家本朝”<sup>③</sup>的地位,则由他进一步推动和强化当地的六朝文风与骈文创作自然不在话下。

与此同时,吴地的复古后俊也在不断挑战先辈的权威。在诗歌领域,王世贞已能与皇甫汈齐名吴下,并以“朝子循而夕元美”<sup>④</sup>之势后来居上,令皇甫氏晚年颇生不平之气。但在文章领域,复古派则要处于相对弱势和孤立的地位,对当地写作习惯的干预也十分有限。同属王氏阵营的吴中文人主要有他的乡试同年刘凤以及魏学礼、俞允文等,他们置身在本地萎弱靡丽的骈文环境中,时常发出“众

① 皇甫汈《皇甫司勋集》卷五四《黄先生墓志铭》,明万历二年(1574)吴郡皇甫氏自刻本,第6b页。

②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六八《〈潘润夫家存稿〉序》,第7册,第3302页。

③ 胡应麟《少室山房集》卷一〇五《题〈皇甫司勋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1290册,第765页。

④ 冯时可《雨航杂录》卷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7册,第355页。

人皆醉我独醒”的无奈感慨，因而彼此珍视为志同道合的文友。如王世贞的《〈俞仲蔚集〉序》称，俞允文“自托古文辞特甚……以故益日与诸少年倍，仲蔚之文与声不能走阊阖而南北。虽然，海内更二三君子，亡鄙余者，与仲蔚相欢足老也”<sup>①</sup>。嘉靖三十八年，刘凤因母丧“居恤，得季朗（即魏学礼）乃大快……相与砥”<sup>②</sup>。其中，刘凤又是皇甫汈二哥皇甫濬的妻弟、四弟皇甫濂的进士同年兼僚友，多重亲厚的社会关系使他与皇甫汈之间得以维持着疏而不离的礼节性往来，但却无法缓和二人文章观的潜在矛盾与截然对立。刘氏自负文章高古，所作多佶屈聱牙，走的是复古派“文必秦汉”的典型路子。谈迁在《北游录》中记载了一则故事：

吴县袁景休孟逸，喜歌诗，卖卜终老。刘子威以文自负，景休每向人摘其字句钩棘文义讹谬者，以为姍笑。子威闻之大怒，诉于郡尉，掇而笞之。尉诘曰：“若敢复姍笑刘侍御文章耶？”景休仰而对曰：“民宁更受笞数十，不能改谗刘侍御也。”尉笑而遣之。<sup>③</sup>

自己的文学理念不仅鲜为时人赏识，还沦为了乡里笑谈，刘氏对此意殊愤愤。这种情绪在他的诗文作品里多有流露，并终于在皇甫氏死后转为对其骈文水平与文学成就的明确抨击和全面否定。

刘凤对皇甫汈骈文的批评建立在质疑其文坛地位合法性的基础之上，而这恰恰反过来说明了皇甫氏在吴中骈文风气中拥有的号召力和代表性。他在《〈四六铨镜〉引》中这样写到：“皇甫氏力不逮作者，而更寡学，虽复窃名，殊自鄙浅。……迨于鳞、元美作，而一洗之，快夫！然安庸者至谓吴人语与优笑伍，痛夫！”<sup>④</sup>可见，虽有李攀龙、王世贞以强力推行古文，吴中文学的地域形象和主流体式依然与骈文密不可分，这在当时是一种共识。当然，刘凤更愿意将之视为一种误解和偏见，并认为皇甫汈虽然位尊名高，却并不具备代表吴中文学最高水平的实力。在《记游》一文中，刘凤又对皇甫氏的“窃名”之举做出了具体解释：“若子循自序其文，而其旨乃直叙得交海内名高者以为重，予鄙之甚。且彼专以交道名者，竿牍纷然，借其延引接纳，若蔓之附枝，非不蓬茸盛，亦何强干之有？”<sup>⑤</sup>如果作家获取文名的途径有不正当之嫌，则其作品的文学价值也会随之大打折扣。刘氏对皇甫汈的这些指摘固然有夸大失真之处，然而其中已隐现出两种文章观相争的强烈张力。

## 二 吴中文统观的差异及其成因

在对皇甫氏及王、刘等人的文章观内容展开详细讨论前，有必要首先就双方在吴中文统定位问题上的分歧做一辨析，因为这是二者产生文学理念整体冲突的出发点。

前七子的文学主张里带有明显的北方文化烙印。如李梦阳、康海等关中文人宣扬“文必秦汉”，浑厚雄伟、刚毅奋强的地域特质是他们选择以秦汉古文作为学习典范的精神渊源。而徐祯卿无法脱尽的缘情绮靡的江南笔调在李氏等北人眼中则是“守而未化”的缺陷<sup>⑥</sup>。嘉靖初，复古运动式微，其余势一时变为六朝初唐体的盛行，这就相应地推动了文学审美重心由北向南的地理位移。另一方面，大礼议事件又造成明廷较大的人事变局，使得原有的文学权力结构遭到严重破坏。于是，王慎中、屠应峻、唐顺之、皇甫汈、陈束等年轻进士们就构成了新朝创作的精锐力量，接过了嘉靖前期的文学话语权。他们以意气风发的姿态开展了频繁而投机的酬唱活动，吟哦、挥洒了不少取材齐梁、典则初唐的诗文佳篇，有力地加速了这一文学南风的升温。其中的苏籍文人们对六朝文学等本就有天然的地缘亲

①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六四《〈俞仲蔚集〉序》，第6册，第3119—3120页。

② 刘凤《刘子威集》卷四三《记游》，《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7年版，集部第120册，第454页。

③ 谈迁《北游录》，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19—320页。

④ 《刘子威集》卷五一《〈四六铨镜〉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20册，第675页。

⑤ 《刘子威集》卷四三《记游》，《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20册，第455页。

⑥ 李梦阳《迪功集》卷首《〈迪功集〉序》，台湾伟文图书出版社1976年版，第2页。

近感，他们在积极投入创作的同时更多了几分捍卫地方文学尊严、提高南方作家地位的责任感。以皇甫汈为例，他的不少作品都在朗声宣扬着“文蔚吴中，才臻江左”<sup>①</sup>的积极论调，不时流露出强烈的地域文化自信心理。而这在皇甫汈等人试图重塑徐祯卿文学史形象的努力中又得到了尤为显著的反映。

徐氏少时作文深染本地风尚，后登第入京，结识李梦阳，始生悔改辙。可以说，他自觉吸收了北方文人的复古理论，主动调整自己的创作模式，有意识地控制了吴中元素的泛滥。徐氏生前亲手编定《迪功集》，删弃了许多少年时的得意之作，其中便包括“文章江左家家玉，烟月扬州树树花”这类风流靡丽的名句。但皇甫氏更愿意挖掘徐、李关系中潜在的对抗因子：

弘、德之间，李、何诸子追述大雅，取裁风人，一时艺林，作者响臻，同好景附，咸足驰骋海内，而徐君亦独步江左矣。然而意见枘凿，造诣堂室，耻凌好胜，诋诃生焉。<sup>②</sup>

他认为，徐祯卿代表的江左文学，不仅与北方复古文学旨趣殊途，更有水平高下之分。其兄皇甫汈访得徐氏遇李梦阳前的早期遗文，补刻成《外集》一部，即意在强调和展露他身为吴中文人的天然本色与敏锐才情，给李氏一派主导的文学史定论做翻案。

相反，另有一些吴中人士持论迥异，他们痛感于本土文学浮薄萎弱的流弊，因而表现出自我反省、自我批判的强烈决心。王世贞《〈李氏山藏集〉序》云：“某吴人也，少尝从吴中人论诗，既而厌之。夫其巧倩妖睥、倚闾而望欢者，自视宁下南威、夷光哉？然亦亡奈乎客之浼其质而睨之也。思一遂遍观中原下上绝艺之士而不可得。”<sup>③</sup>他对格调卑下的写作旧习心生厌恶，所以北投质实浑朴的中原文化以寻求出路。在对徐祯卿文学地位的争议中，他们也更倾向于回归旧说，所以尊李氏而攻徐氏：“三吴轻隽，复为昌谷左袒。摘瑕攻颡，以模剽病李，不知李才大固苞何孕徐，不掩瑜也。李所不足者，删之则精；二子所不足者，加我数年，亦未至矣。”<sup>④</sup>其心理内核实是对吴中标志性的六朝文风等的否定。如刘凤提出，明初以来国风尚属古质，“乃徐昌谷、黄省曾辈复翕然以六朝为，而李、何复矫之”<sup>⑤</sup>，对后者的做法明显持赞赏态度。当袁尊尼继皇甫氏之后又刊印了《迪功五集》时，王世贞更是去信责问，言辞激切：“此集殊多下乘恶趣，大抵六朝，时沿晚唐，以此标饰迪功，如出狐白之裘而益羊蕞也。”<sup>⑥</sup>因为在王氏眼中，徐氏浸淫了齐梁俗调的少作正是其文学生涯中亟待抹杀的污点。

简言之，双方的吴中文统观存在着本质的区别：皇甫汈等人持尊崇立场，他们以本地风光为荣，将技尚奇巧、辞工精良视作他们操笔握纸时所拥有的先天优势，犹如盛装美人顾影自怜；王世贞、刘凤等则以贬低态度为主，他们不满于这种雕琢文饰、缘情绮靡的诗文传统，讥之为娼妇浓妆艳抹、倚门卖笑。

在自矜国色和斥若俗粉这两个有着天壤之别的价值判断间，横亘着一条时隔仅十数年却不容忽视的文学经验上的代沟，而这正是造成二者观点相悖的重要原因。首先，从地域文学的角度来看，皇甫汈等恰好生值吴中派鼎盛的黄金时代，而王世贞等则已是成长于它的衰变期了，所以，其创作水平与诗文成就的升降兴替已经早早奠定了吴中文统在二者最初文学思想中的地位落差，并进而影响到他们文学观念的发展成熟以及对未来文学道路的选择；其次，从整个明代文学的全局来看，活跃于嘉靖前期的文人正当第一次复古运动之末，他们面临的文学残景是习古的模式化。皇甫汈的《〈徐文敏公集〉序》指出：“余览唐子应德叙《中峰集》曰：‘弘治以前，未尝言秦汉而能尽其才；近守绳墨而不离乎法。’盖病乎世之决裂以为体、恒钉以为辞。公之文庶几类此。”<sup>⑦</sup>可见，他跟同时的唐顺之在分析、

① 《皇甫司勋集》卷三八《〈祝氏集略〉序》，第1a页。

② 《皇甫司勋集》卷三六《〈徐迪功外集〉后序》，第12a页。

③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六四《〈李氏山藏集〉序》，第6册，第3116—3117页。

④ 王世贞《艺苑卮言校注》卷六，齐鲁书社1992年版，第302页。

⑤ 《刘子威集》卷五一《〈四六铨镜〉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20册，第675页。

⑥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二二《袁鲁望》，第11册，第5713页。

⑦ 《皇甫司勋集》卷三六《〈徐文敏公集〉序》，第16a页。

总结前人创作不足时意见一致。而近取于自己所熟悉的才情流溢、声辞宛畅的吴中文学手法，正可以顺理成章地避免生硬晦涩的文病，打破僵局，另辟蹊径。于是，长久以来被边缘化的六朝文得以正大光明地加入主流，这无疑使得皇甫汈们在对本土文学的认知里夹杂了更多正面的肯定与自信。但到了嘉靖后期，王世贞、刘凤们觉察到的是，曾由“昌谷示委，勉之泛澜”的“六朝之华”已开始沦为浅薄娱玩者避难和标榜的渊藪，“文”、“辞”的过度膨胀抢夺了“质”、“理”的生存空间，因而他们不得不再次借由文学复古运动这一载体，重建雅正的美学体系与严肃的儒学命题。

### 三 文学语境下的骈散之争

对“文”、“质”关系的辨析一直是骈散之争里的核心话题。虽然文质彬彬、辞理兼备是两派作家都应当追求的理想化的艺术效果，但在正统的儒学化、功利化文学语境里，“文”往往处于较为尴尬、被动的位置：首先，“文”虽然是不可或缺的成分，却是寄生在“质”之上的附属品，无法产生自主的功能价值；其次，“文”的比重受到了严格控制，不容喧宾夺主。如果明目张胆地追求声色审美，就会招来道德、世运方面的谴责。由此不难发现，在审判骈文的法庭上，王世贞、刘凤等持反对意见者更容易占据现有理论体系的制高点，从容不迫地展开攻势。

刘凤在《寄汤博士》中说：“夫古固云立意为宗，然即《庄》即《左》即《国策》，其词何蔚若！每一读之，觉其新思，虽千载，朗而不渝。若彼唐宋人文，未读辄已厌之，谓不由词哉？由意命词，由词构篇。意不理逊，则词不畅融。固未有词不原意者，而篇胡不在词与？若俳体又似专以词。”<sup>①</sup> 他的论述以重“词”为掩护开篇，但经过“由意命词”这一番逻辑转换后，实则进一步强化了“词”对“意”的依赖性和“意”对“词”的绝对领导。在刘氏看来，“未有词不原意者”，所以不存在能够逾越“质”、“理”的缺陷而独立成功的文学形式。唐宋古文虽然以载道为宗旨，尚且因“意不理逊”而导致“词不畅融”，令人难以卒读。则专主辞采的骈文如果夸耀它在艺术领域能达到卓越的造诣，那也是很值得怀疑的。皇甫汈以仰攻之势迎战对手的俯冲，就必须采用逆向思维，极尊“文”的身份：“两仪莫位，二曜扬辉，经纬其间，书契攸作。文之时义，远矣哉！虽有懿德鸿勋，非假《典》、《谟》，曷由宣阐？故寿不固于金石而名可齐于霄壤者以此。世之谈理学者诋为末艺，守吏局者谓非适用。殆犹茹藭糗者，难与道躅腹之美；蒙旗毳者，不足与语绮縠之华也。”<sup>②</sup> 他指出，“文”的诞生可上溯至鸿蒙初辟，远远早于各种“意”、“理”概念的形成，所以它不可能是“质”的副产品。相反，人类文明中那些无形的德、业都要经由特定的“文”的形式来表达、传承，这样一来，“文”也就顺利地反客为主了。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此论出自皇甫汈为兄长皇甫濬的诗文集所作的序言，所以他还有意将以《典》、《谟》为标志的六经纳入了文学化创作谱系的源头，而这也是论证“文”的合法性的重要手段之一，并在明中叶吴人祝允明为六朝文做辩护时已露端倪<sup>③</sup>。在《〈文选双字类要〉后序》中，皇甫汈又以华丽的笔调完整地勾勒了这条文统：

至乃金玉三坟，笙簧五典；矧郁存姬监，斐妙尼裁。玄风浸扬，丽藻逾蔓，家称成诵，人尚含章。莫不踵其事而增华，缘诸情而绮靡。嬴炎以来，于斯为盛。<sup>④</sup>

将抽象的“文”、“质”理论模式引申至具体的文学史范畴，又自然而然地造成了双方对已有文学成果——主要是秦汉文和六朝文——做出完全相反的价值评判。这固然是因为秦汉和六朝分别代表了散

① 《刘子威集》卷五〇《寄汤博士》，《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20册，第648页。

② 《皇甫司勋集》卷四〇《〈司直兄少玄集〉叙》，第3b—4a页。

③ 详参黄卓越《明中后期文学思想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3—154页。

④ 《皇甫司勋集》卷三五《〈文选双字类要〉后序》，第9b页。

文和骈文的黄金时代,所以成为了主散、主骈两派文章观激烈交锋的前沿地带。但对吴中文人来说,其中又有着更加独特、复杂的历史渊源。

明中期,吴中派兴起古文辞运动,其萌芽要明显早于前七子在京师发起的文学改制,所以它并不单纯属于复古大潮的一个地方分支。而这也使得吴中文人在呼应文坛主流口号的同时,又保有了不少基于地方经验和感性审美的诗文理念。王世贞把祝允明视为吴中文章复古主义滥觞的关键人物,这是大致不差的:“吴中祝允明,始仿诸子,习六朝,材更僻涩不称,皆似是而非者。然古文有机矣……”<sup>①</sup>可见,秦汉文和六朝文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本形态本就和谐并行于吴人的文学意识中,不存在尊此卑彼的偏见。这一点与复古激进派“文必秦汉”暴露出的排他性有很大不同,也为之后皇甫氏与王、刘论争提供了一个可以水平对话的思想基础。

王世贞们的理论基本上是一种文运世衰论的老调重谈:“吾尝论孟、荀以前作者,理苞塞不喻,假而达之辞;后之为文者,辞不胜,跳而匿诸理。《六经》也,四子也,理而辞者也;两汉也,事而辞者也,错以理而已;六朝也,辞而辞者也,错以事而已。”<sup>②</sup>如前所述,“质”或“理”是王氏等人断文的核心标准。六朝文只流于绘藻(“辞”)和用典(“事”)这些肤浅不实的形式主义细节,所以较之含“理”的秦汉文低劣;而先秦文又优于两汉文,因为“理”在其中的地位高、比重大。然而,与前七子复古派相比,后七子阵营的成员又要面临新形势下的多重任务:即除了克服六朝初唐派和唐宋派造成的浮靡、卑衍的问题,还要反思复古实践自身的“模剽”之病,应对其他流派的“摘瑕攻纇”。这使他们在重申传统理论的同时,又不得不增入新的注解:

有吴自迪功始为六代,江夏复恢之,则其靡于今者是矣。济南作,则视献吉又变而之古,一时诸君相与应之,自谓左氏、太史复出矣,然议者谓伤于袭哉。其所铸词,必范之古,是矣。然途辙尺寸,一将循其故步,是犹且不可,而况抵掌谈说,若优笑之为乎?<sup>③</sup>

当每种文学主张都出现危机时,必须多方权衡,综合考量,才能重新确立未来的走向。刘凤疾呼:“夫文胜而靡,固当救之以质,而今之所尚,是犹若患文之不足者。”<sup>④</sup>创作六朝骈文犹如做优笑行径,巧言令色,戏谑为乐,缺乏深刻的内涵和超拔的气格,久而久之必将不利于文学的健康发展。所以,尽快遏制它的蔓延才是当务之急。摹写秦汉文虽然有袭古不化的毛病,但这不过是技术层面的问题,无伤大雅,并不能就此轻易否定它对拯救文风靡下的积极作用。

皇甫汈则坚持“就文论文”,认为“藻艳之中,有抑扬顿挫,语虽合璧,意若贯珠,非书穷五车,笔含万化,未足云也”<sup>⑤</sup>。他从纯文学的角度“为六朝人张价”,热情赞美了六朝作家出众的才学以及六朝骈文在修辞、声律、结构等各方面达到的综合成就。相反,对于复古派极度推崇的秦汉古文的艺术水准,皇甫汈则予以了毫不留情的批评:“夫比属义意,则汉隼非工;弋钓篇章,则左奇为劣。……或谓雕琢琼瑶,遗恨抱璞;刻削杞梓,取讥不材。嗟乎!寸珪尺璧,咸足云宝;制锦裂缞,奚病为华?此固玩物者之致曲,而非忘筌者之通津也。”<sup>⑥</sup>他认为,骈文的艺术美自有其独立价值,对精美的文学形式的追求本身并没有过错。如果真心致力于纯文学事业,并在该领域内达到较高的造诣,那么即使被讥为“玩物者”,也胜过那些以“质”、“理”为借口掩盖文笔低劣的人。末句明显含有自我解嘲和反驳对手的意味,正是他做出的巧妙还击。

① 《艺苑卮言校注》卷五,第235页。

② 《艺苑卮言校注》卷一,第37页。

③ 《刘子威集》卷一〇《送魏季朗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20册,第31—32页。

④ 《刘子威集》卷五〇《寄王司徒》,《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20册,第650页。

⑤ 《艺苑卮言校注》卷三,第150页。

⑥ 《皇甫司勋集》卷三五《〈文选双字类要〉后序》,第9b—10a页。

#### 四 骈文创作旨趣的分歧

事实上,创作骈文不仅是吴地出身的王世贞、刘凤等人无法彻底摆脱的文学习惯,还是他们主动炫耀杂学博通的一种方式。王世贞承认,自己喜欢引经据典,所以创作了不少六朝文,而且因为不能割爱,还将它们付诸刻印。刘凤多次讥讽骈文是“优笑语”,却照样在文集中收录了数篇体裁各异的俳体文。他还亲自指导子孙据《艺文类聚》辑录成《四六铨镜》一书。但这并不能简单地归咎于他们的“言行不一”,如果结合其整个文学史观来看的话,这番抵牾确有可以自圆其说的根基。

王世贞提出:“西京之文实,东京之文弱,犹未离实也;六朝之文浮,离实矣;唐之文庸,犹未离浮也;宋之文陋,离浮矣,愈下矣,元无文。”<sup>①</sup>不难发现,在这条演变脉络里,文章总体水平是沿着西汉至元朝的时代顺序依次递减的。其中,六朝是文章“离实”的一个转折点,但其文虽“浮”,仍具备了较高的艺术技巧。唐宋文庸陋,元无文,则连外在的文学空壳也一并沦丧了。因此,王氏在列举有助于提高写作水平的文学经典时,对李梦阳劝人勿读唐以后文的偏激说法予以理解和认可,并指出除了秦汉那些公认的古文名著以外,还有六朝文及韩柳文可以适当地择优选读。综言之,在王氏等人的文章体系中,六朝文处于居中位置:当它与秦汉文(包括对秦汉文的摹写)做比较时,只是一种华而不实的次等文学形式,所以要尊散贬骈;当它与唐以后文做比较时,则又成了最具审美价值的空文,所以不妨尊六朝而贬宋元。

因此,王世贞、刘凤对六朝文秉持了一种辩证态度。如王氏在《艺苑卮言》中云:“吾于文虽不好六朝人语,虽然,六朝人亦那可言。……然如潘、左诸赋,及王文考之《灵光》,王简栖之《头陀》,令韩、柳授觚,必至夺色。……非直时代为累,抑亦天授有限。”<sup>②</sup>所以,他们并不完全反对写六朝骈文,但反对堕入宋元习气的骈文创作:

又其降也,假之俳谐以遁其情。瘳缓单弊,若人相与语,不能揔意、抗辞、诘质,而依阿、支注、柔拙,殆中有惭沮然,气何索甚!而犹且妄托齐梁间,且彼其复何至是也,是特滥觞元宋余,何使人溺焉不复觉。<sup>③</sup>

“瘳缓单弊”、“气何索甚”等问题明显与两宋骈文散化后出现的新特点有关。刘凤指出,近时某些自称步趋六朝的骈文作家,事实上已受这些特点异化,创作的并不是正宗的六朝骈文。而他们抨击皇甫汈的另一个原因,就在于其“文慕称六朝,然时时失步”<sup>④</sup>。

王世贞与刘凤在创作实践中也遵循了这一骈文理念。王氏的四六文便被认为具有“整而流,艳而发”、“含吐江左,蹈藉唐初”<sup>⑤</sup>的特点。如其《愁赋》一文,显是仿南朝江淹的骈赋名篇《别赋》、《恨赋》所作,文辞隽秀,对偶精巧,集中体现了王氏骈俪的流丽之美。现截取其中刻画六种愁情的文字为例,以窥一斑:

在昔齐相初羈,燕储未释,狐腋已空,乌头尚黑。赌幸姬兮不顾,望故乡兮长隔。鸡迫明而啜喔,马中夜而茧栗。崤关垂启,追兵已迫。

若乃庆卿既遣,吕王若故,刃隔提囊,尸分踞柱。秦兵电发,檄书星布,君父怨谪,国人指晋。辽左奚匿,易流堪揭,抚头颅而非我,知社稷之他氏。

① 《艺苑卮言校注》卷三,第102页。

② 《艺苑卮言校注》卷三,第150页。

③ 《刘子威集》卷首《刘子威自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19册,第572—573页。

④ 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卷一四九《像赞》,《明人文集丛刊》,台湾文海出版社1970年版,第1期第14册,第6852页。

⑤ 《少室山房集》卷八一《〈弇州先生四部稿〉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90册,第580页。

至如苏季献策，三年不收，燃桂欲烬，因鬼虚谋。貂离披而别体，马蹢躅而异投。鸣机转轧，曷釜谁留。荣将贵逝，辱与贱求。

爰有中废长门，追宠增成。君恩一失，六官见轻。玉阶绝迹，银井无声。明月含波，春花欲霰。官车径度，萧韶别殿。空乞赋于黄金，但沉吟于纨扇。

又乃弃妻斥女，械思寡公。爰爰白兔，趯趯草虫。鸳鸯瓦圻，玳瑁床空。滔戍不归，嘉书未返。铁岭天遥，榆关梦转。睹三星以何夕，叹流年之渐晚。

其或中朝凤女，远嫁乌孙。酪浆盛腥，毳褐奇温。穷庐代宇，服匿承樽。髣髴赭面，啁啾兽言。盼嵯峨之金屋，隔缥缈之玉门。虽托情于黄鹤，竟绝轨于南辕。<sup>①</sup>

刘凤曾在自编文集的序言中明确表达了尊古文、轻俳谐的立场，故“尽屏其旧，置不五年间书，稍衰之为帙”<sup>②</sup>，展露出捐弃早年地方创作习惯的决绝姿态。然而，他特意收入的旧作《茉莉赋》、《拟恨赋》却是两篇典型的六朝骈俪小赋，这种取舍本身就很能见出作者之喜恶倾向。其中，前文云：“尔其丰晖掩暧，佚艳浮轻，生姿婉婉，顾步盈盈。珪玉温而方洁，春雪皓以明贞。劲幽香于盼睐，散郁烈以芳馨。涉清冷而遐寄，托绮靡以传情。”<sup>③</sup> 声情婉转，语言绮艳，有着鲜明的齐梁宫体文色彩。后文则与王世贞《愁赋》一样，更是在向六朝骈文的巅峰之作致敬。

而另一方面，从理论角度看，皇甫汈并没有刻意提出什么骈文革新的主张，相反，却一再表明自己是六朝文的忠实追随者。从实践角度看，他行文喜好堆砌典故，刻镂辞藻，且频繁使用四字和六字的短句对，所以极易给人造成全遵六朝的假象。但若像胡应麟那样，认为皇甫氏“操笔纵横，靡弗如志，几化于六代矣……而文亦不能为宋人之表启，则才具所限也”<sup>④</sup>，则未免囿于思维定势，窥一斑而不见全豹。

“宋人之表启”采用“援散入骈”的手法，其具体表现为多用虚词、长联、散句等，以此来增加行文的疏宕萧散之气。皇甫氏则反其道而行，“援骈入散”，以骈文元素改造散文形态。现取其《〈祝氏集略〉序》一文的选段为例：

自昔文蔚吴中，才臻江左。言偃业于孔氏，独得精华。厥后严、朱并纬汉典，顾、陆竞拔晋庭，方朔寓为书师，伯喈隐兹谈艺，彬彬盛矣。其为俗也，民有轻心，士多师古，伎尚奇巧，物必精良。故览左生之赋而验山川之巨丽，诵平原之诗而测土风之清嘉，考持正之序而睹气状之英淑。至乃翕清以为性，结冷汰以为质，煦鲜荣以为辞美，称竹箭粲等春葩。且至德造自泰伯，峻节亮于延陵。故士之生也，往往玩耽爵服，跌宕琴史，虽鞿鞅未遇，而撰缀不辍。申孤愤于一朝，流芳声于千载，此王孙之诤我公子者也。<sup>⑤</sup>

张燮对皇甫汈的常用文法有过较为准确的总结：“子循文原本六朝，而又以己体出之。六朝织散文为俪语者也，故绮组成其经纬；子循就俪语作散文者也，故流奕济其峻峭。独其间用长联及三叠法，是其英雄欺人，不必多效耳。”<sup>⑥</sup> 由上可见，他擅用的对偶主要是“四四”、“六六”，而这些简易干净的句式可以较为灵活地担任起散文基本语言单位的角色，令全文充满整齐和谐、朗然上口的美感；长联、三叠法的间歇性穿插又有利于保持文风的散行性和流畅性，避免过度骈化。两相结合，最终实现他所追求的“语虽合璧，意若贯珠”的艺术效果。这类手法在皇甫汈的文集中俯拾皆是，它们有别于杨慎等早期六朝派秾艳繁复的套路，更似借鉴了其友人唐顺之等所主导的唐宋派散文的特点，即注重淡泊

①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愁赋》，第2册，第546—547页。

② 《刘子威集》卷首《刘子威自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19册，第573页。

③ 《刘子威集》卷四八《茉莉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20册，第588页。

④ 《少室山房集》卷一〇五《题〈皇甫司勋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90册，第765页。

⑤ 《皇甫司勋集》卷三八《〈祝氏集略〉序》，第1a—1b页。

⑥ 《霏云居集》卷五三《书〈皇甫子循集〉后》，《四库禁毁书丛刊补编》第59册，第625页。



清丽的韵致。可以称之为“失步”，也不妨称之为新变。而这也体现了嘉靖初唐宋文统的回归对复古派日显僵化、狭隘的文学史观的一种反拨。

另一个引人深思的现象是，黄省曾和皇甫汈是并兴一时的吴中骈文名家，但王世贞、刘凤都将前者的骈文成就置于后者之上。王氏本倾向于“整而流，艳而发”的艺术风格，所以不太欣赏庾信的文章，认为它们用典生硬、文气呆滞、缺乏深致。黄省曾的骈文“出潘、陆、任、庾，整丽而不圆”<sup>①</sup>，艺术技法过于重拙，自然不入王氏眼中。但同时，王氏也承认黄文具有一定的“质”、“理”内涵，要远胜于吴中那些不学无术、肤立皮相的作家。注重文章的深度和难度，正是黄省曾、王世贞和刘凤这类学者型文人的共性之一。他们普遍多闻广识，通过以学养文，达到才学兼修。如黄省曾的《刻〈水经〉序一首》堪称一篇“水”的小史，在有限的篇幅中穿插了大量相关的历史、地理信息；王世贞的《开国功臣赞》、《壬午诸臣赞》、《浙三大功臣赞》是借四六之典正以作史笔之用；刘凤的《述真论》、《俶道解》则是用骈体行论理、释义之事。这固然使得他们的骈文具有厚重深刻的优点，但也容易失之晦涩枯燥。而皇甫汈是才子型文人，刘凤称他“名奕奕，流艳而薄于质”<sup>②</sup>，颇有轻慢之意。从上文所引的那些片段中就能发现，他的骈文往往不带多余的包袱，大抵文辞浅净，表意明朗，故而晓畅通俗，易于解读，虽渊藻不足，却文气清新，神采超逸，更具有生动潇洒的艺术感染力。而这很可能也是皇甫氏的骈文活动享有广泛声名、能够自成一家的重要原因吧。结合上一节的分析看，这一区别也正是双方文质观在骈文领域的相应体现。

总言之，正是由于二者在文学史观和文质观上存在着的根本分歧，最终导致双方在骈文创作的具体手法及风格上也表现出了截然相异的旨趣。

[作者简介] 李慈瑶，女，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

(责任编辑 马 昕)

① 《艺苑卮言校注》卷五，第235页。

② 《刘子威集》卷四三《记游》，《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20册，第454页。